

# 西方大眾傳媒與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 ——以《紐約時報》對莫言的報導為例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broad and  
Western Mass Media: Reporting on Mo Yan by *The New York Times*

謝燕紅 (Xie Yanhong), 李剛 (Li Gang) \*

## 引言

一百年前，隨著現代大眾媒體的興起，一方面「中國文學傳播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即從原來書本形式和勾欄瓦舍的說書方式傳播發展到以報刊和書籍為主要載體的傳播方式。」<sup>1</sup>另一方面，大眾傳媒又不僅僅是現代文學作品的承載方式，刊登在報紙期刊上的大量圖書廣告、文學批評、作家的逸聞趣事等各類新聞報導強有力地影響了讀者的閱讀選擇，提高了現代文學作品的大眾影響力與傳播效率。而中國現代文學甫一發生，有識之士即積極將之推廣至西方，面對一個更加複雜的跨文化傳播語境，西方大眾傳媒的作用尤為凸顯。早在1936年，美國著名記者愛德格·斯諾 (Edgar Snow) 編選的中國現代文學英譯選集《活的中國：中國現代短篇小說》(*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在美國出版時，倫敦《英國泰晤士報·文學評論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專門刊發了書評，作為英語世

界最老牌、最權威的大眾媒體之一，該報的影響力毋庸置疑，能夠登上《泰晤士報》的版面對期待走向世界的中國現代文學而言，無疑為一大幸事，而報紙所給予的積極評價——「我們能接觸到的來自中國的書太稀少，因此，這部現代中國小說的譯作具有歷史性意義。此書的編者是生活在北京的美國記者斯諾先生，這就使它具有更加不同凡響的意義。斯諾先生為西方文明對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造成的深刻影響提供了強有力的解讀，為文藝研究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做出了卓著貢獻。」<sup>2</sup>——不僅為西方讀者做了正面引導，提升了《活的中國》在英語世界的知名度，更為願從事中國現代文學海外傳播工作的譯者專家提增了信心。

百年來，西方大眾傳媒在中國現代文學海外傳播中起到了積極作用。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曾經提出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波動原則」，即中國現代文學的海外傳播與中國新聞在西方媒體的曝光率相對應，如果一階段沒有相關中國新聞，這一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

\* 作者謝燕紅為常州工學院教育與人文學院教授；李剛為江蘇理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教授。本文獲中國大陸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海外中國現代文學英譯選本研究」階段性成果資助。

1 蔣曉麗，〈不獨立的文學大眾傳播方式——論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文學傳播方式的嬗變〉，《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5: 82-86。

2 舒雲童，〈愛德格·斯諾、魯迅及《活的中國》〉，《世界文化》2010.12: 26-27。

的接受和消費便相應減少。<sup>3</sup> 西方大眾傳媒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推介和報導既是西方世界對待中國現代文學態度的一個風向標，也成為中國現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直接助力。

從 1988 年的首次亮相，到 2012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得到濃墨重彩的報導，莫言及其作品因《紐約時報》的持續關注而在西方世界得到廣泛傳播，圖書翻譯量和銷售量激增。中國現代文學自發生之日起，便在英語世界進行譯介傳播，但收效甚微，大部分作家作品常常只是作為政治或社會事件的註腳被報導，作品自身的文學價值被西方媒體想當然地忽略了。《紐約時報》對莫言及其作品的報導，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借助西方大眾傳媒進行推廣與傳播的經典樣本與案例，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審視西方老牌媒體與中國現代文學海外傳播的關係、西方知識界及普通大眾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喜好傾向。

## 一、從電影註腳到書評專欄

創辦於 1851 年 9 月 18 日的《紐約時報》是一份在美國紐約出版、在全球發行的日報，作為美國三大主流報紙之一，該報是美國社會公認的歷史記錄性報紙，美國人日常獲取資訊最重要的來源之一，每年發行近 200 萬份，擁有幾乎覆蓋全球的話語權。1896 年 10 月 10 日書評專刊《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NYTBR*）問世，此後的 100 多年間，《時報書評》無論在出版界、學術界還是普通讀者心目中的分量都越來越重，甚至有出版商認為，一本書想要在西方世界廣為人知，成為暢銷書，就必須登上《紐約時報》的版面，而摘自《紐約時報書評》的關於一本書的評論往往會被印在該書的顯要位置，成為該書最好的廣告。美國哈潑科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 Publisher LLC）總編輯丹尼爾·哈爾本（Daniel Halpern）曾經說過，如果得

到《紐約時報》的一篇正面評論，可以對書的銷售產生巨大影響，在全美各地激起一波波的漣漪；即使沒有正面評論，如果能在《紐約時報》這樣重量級的媒體上被大罵一頓，對書商來說也是個不錯的機會。<sup>4</sup>

《紐約時報》秉持力求公正、擯除個性的辦報宗旨，一度因其古典嚴肅的風格，被戲稱為「灰色女士」（The Gray Lady），其新聞評論報導雖夠深入，但筆法單調，缺乏震撼力，讀來總覺不過癮，這樣的風格也影響至《紐約時報》書評的撰寫。甘陽這樣評價說：「《紐約時報書評》之所以長期不為美國知識界所喜，原因之一也就在這種『報導事實』般的書評往往一是大多缺乏書評作者本身的見解，其次則文章多半是四平八穩的溫吞水而無關痛癢，同時，編輯部本身力圖保持中立性的傾向實際上也往往變成其無判斷性，亦即它差不多總是以同樣的有限篇幅處理每一本被評的書，以致在一期雜誌上所有被評之書似乎都是同等重要的或不如說都同等不重要，因為看不出哪本被評的書是特別值得注意的。」<sup>5</sup> 「力圖保持中立性」對讀者來說或許在可讀性上打了折扣，但對在美國屬於「弱勢群體」的中國現代文學而言，卻值得慶幸——這種中立性使《紐約時報》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藩籬，擯除了非此即彼的價值判斷，從而可以形成更為豐富的多元視野，並做出較為客觀的評價。

中國現代文學自發生之日起，便在英語世界得到譯介和傳播，但收效甚微，特別是在美國普通讀者群中，幾無影響。大眾傳媒也較少關注，很長一段時間內，《紐約時報》對於中國當代作家和作品的報導只是零星地出現在各個版面上，甚少有集中性、高密度的報導，又因「美國媒體對中國文壇的關注多是具有政治指向的。對中國作家的報導不是從作品本身出發，而是以具有政治色彩的人物與事件為契機，簡略提及作品」，<sup>6</sup> 大多數情況下，中國文學作品只是作為政治事件或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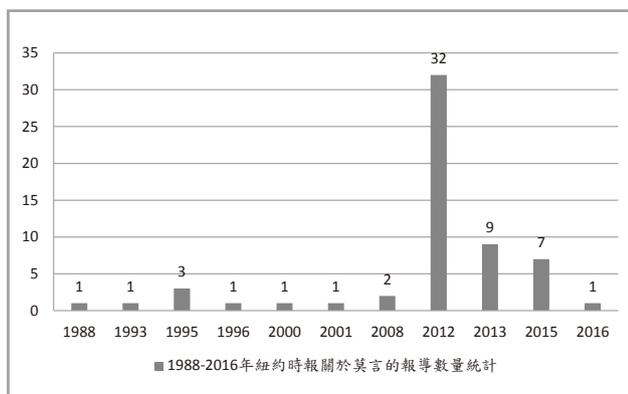
3 謝稚，〈從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看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理論月刊》2012.12: 53-56。

4 Brain Hill, Dee Power, 陳希林譯，〈暢銷書的故事：看作家、經紀人、書評家、出版社及通路如何聯手撼動讀者〉（臺北：臉譜出版社，2006），頁 72。

5 甘陽，「《紐約時報書評》一百年」，<http://www.cssm.org.cn/view.php?id=30442>（檢索日期：2009.9.20）。

6 崔豔秋，「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現當代小說在美國的譯介與傳播」（吉林：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4），頁 18。

事件的註腳被報導，作品的文學價值被西方媒體想當然地忽略了，這也可視作中國現代文學海外傳播狀況不佳的一個表徵。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提升，中國文學國際影響力的逐步擴大，《紐約時報》也加大了對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的報導力度，莫言、北島、馮驥才、韓少功、蘇童、賈平凹、沙葉新、王安憶、閻連科、余華、張承志、張賢亮等名字及其作品都在《紐約時報》各欄目出現過。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紐約時報》對莫言及其作品的報導，可謂連篇累牘，這也使該報對中國文學的報導實踐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借助西方大眾傳媒進行推廣與傳播的經典樣本與案例，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審視西方媒體與中國現代文學海外傳播之關係、西方知識界及普通大眾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喜好傾向（見下圖：1988-2016 年紐約時報關於莫言的報導數量統計）。



自 1988 年「莫言」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到 2016 年上半年，《紐約時報》共有 59 篇關於莫言及其作品的新聞消息與文學評論，2012 年更是達到了驚人的 32 篇，這些報導有刊登在《紐約時報》英文版上的，也有經翻譯或直接用中文報導發表在中文網上的。《紐約時報》第一篇有關莫言的報導出現在 1988 年 10 月 9 日，這是一篇題為，“Film Festival; Social Realist Fable of 1930’s China”（電影節；1930 年代中國的社會現實寓言）的影評，作者文森特·坎比（Vincent Canby）是《紐約時報》電影和戲劇欄目的首席影評員，這篇報導主要討論了根據莫言同名中篇小說改編的電影《紅高粱》。1988 年，《紅高粱》獲得了第 38 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

成為首部獲得該獎項的亞洲電影。上述報導對電影導演張藝謀和影片劇情做了較為詳盡的介紹，並預告了 10 月 9 日當天晚上，《紅高粱》將在第 26 屆紐約電影節閉幕式上放映的消息。關於莫言，報導僅一句話，即提及這部電影「改編自莫言的小說」。80 年代中後期，莫言憑藉《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等作品在中國文壇引起轟動，但對坎比這樣的西方評論家而言，莫言還只是一個籍籍無名的中國作家，《紐約時報》關注的是電影《紅高粱》，而非小說《紅高粱》，莫言在《紐約時報》的第一次亮相只是電影《紅高粱》的一個註腳。《紐約時報》對電影《紅高粱》的推介，並未刊登在著名的《紐約時報書評》版面上，卻也讓西方讀者第一次通過西方大眾傳媒知曉了莫言的名字，更令莫言走出了西方漢學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領域，進入了《紐約時報》這樣一個現代傳媒的公共空間，這為後來葛浩文翻譯《紅高粱家族》小說，並成功打入歐美圖書市場拉開了帷幕的一角。

莫言的消息再次登上《紐約時報》是在五年之後，1993 年 4 月，葛浩文翻譯的莫言小說《紅高粱》由紐約維京（Viking）出版社發行，《紐約時報》第一時間刊載了關於《紅高粱》的書評——“Anarchy and Plain Bad Luck”（〈無政府與厄運〉，1993 年 4 月 18 日），書評強調並進一步說明電影《紅高粱》只是借用了小說《紅高粱》的故事梗概，莫言敘事中生動豐富的細節並未在電影中得到充分呈現。這是《紐約時報》關於莫言作品的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書評，作者 Wilborn Hampton 時任《紐約時報》國外新聞欄目編輯，同時也是一位作家，他的書評相當嚴肅和客觀。他提醒讀者，小說《紅高粱》與電影《紅高粱》存在諸多差異——這一點尤其重要，西方讀者會因兩者的不同，而避免將小說和電影混為一談，這能更好地凸顯小說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在該書評的最後，Hampton 提到了莫言文學世界中最重要文學地景——高密東北鄉，認為莫言的作品已經「將高密東北鄉安全的納入了世界文學的地圖」。如同西方讀者較為熟悉的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郡、瑪律克斯的馬孔多小鎮、梭羅的瓦爾登湖，Hampton 用世界文學地圖的概念將莫言的作品納入，對莫言不可謂是一種褒獎，同時，也以巧妙的方式引起了西方讀者的關

讀興趣。對普通讀者而言，閱讀莫言的作品，相當於彌補了文學地圖上那空白了許久的一個當代中國板塊。在這篇書評的最上方，是葛浩文翻譯的《紅高粱》廣告：「*RED SORGHUM* A Novel of China. By Mo Yan.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 359 pp. New York: Viking. \$23.50。」作者、譯者、書名、篇幅、出版社、價格等資訊一應俱全，《紐約時報》力推此書的意圖不言而喻。

《紐約時報》關於莫言的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書評激發了葛浩文的翻譯熱情（此後，莫言與葛浩文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係），同時引發了西方出版社的出版興趣。1995年，葛浩文翻譯的《天堂蒜薹之歌》在美國出版，《紐約時報》用多種方式對這部小說進行了報導，邀請專欄作家和中國問題專家 Richard Bernstein（理查·伯恩斯坦）寫了一篇較長的書評“A Rural Chinese ‘Catch-22’ You Can Almost Smell”（〈你能聞到的鄉土中國的「二十二條軍規」〉，1995年6月12日）（一般來說，《紐約時報》的書評都是短小精悍的），Richard在書評中對這部小說不吝讚美之詞，認為「這是一部中國最好的小說家創作的精彩的，多變的小說」，並稱莫言是中國的「魔幻的現實主義」作家，「他以一種逼真的現實主義為基礎，以對現實生活的靈敏嗅覺，在小說營造了怪誕的氣氛」。此外，《時報》還通過「編輯推薦」等欄目，用1-2句短論向西方讀者推薦這部小說，例如 Michael T. Kaufman 的簡短書評<sup>7</sup>用了「異國情調」、「和你以前讀過的任何小說都不一樣」這樣的字眼，如是評價與其說是書評，不如說是廣告詞。相較專業的評論，這樣簡短的推介通俗簡潔，更易引發西方普通讀者的閱讀興趣。《紐約時報》對莫言的報導，提升了莫言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也有力地推動了莫言作品在海外的傳播。此後，莫言的諸多作品先後被譯為法語、英語、韓語、日語、希伯來語、義大利語、德語、瑞典語、挪威語等多種語言，在多國出版，莫言成為當之無愧的第一位真正意義上在世界文壇形成較大影響的中國當代作家。

## 二、從持續關注到重點推介

新時期以來，隨著中國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尤其是當代文學創作本身的繁榮，西方世界逐步改變了對中國大陸文學的看法。《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選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編者劉紹銘和葛浩文在談到《活的中國》時認為：「如果斯諾在今天重做這部選集，他一定不會如此委曲求全。1980年代新一代的中國作家不僅與他們的前輩一樣憂國憂民，而且通過他們富有天賦的寫作將20、30年代的批判現實主義發揚光大。」<sup>8</sup>中國文學獲得世界認可的不二法門最終還是不斷推出新的優秀的作品，正如莫言所言：「我知道有一些國外的讀者希望從中國作家的的小說裡讀出中國政治、經濟等種種現實，但我也相信，肯定會有很多的讀者，是用文學的眼光來讀我們的作品，如果我們的作品寫得足夠好，我想這些海外的讀者會忘記我們小說中的環境，而會從小說的人物身上，讀到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一句話，好作品能讓海外讀者摘下『眼鏡』。」<sup>9</sup>可以說，莫言用他的創作讓西方的評論家們摘下了「眼鏡」。

2000年，《當代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 Today*）出版了莫言的評論專輯，集中刊登了7篇莫言研究論文。同年，莫言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做了題為「我在美國發表的三部作品」（*My Three American Books*）的演講。這一年《酒國》還獲得法國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Prix Laure-Bataillon*）；2001年，《紅高粱》成為唯一入選 *World Literature Today* 評選的75年（1927-2001）40部世界頂尖文學名著的中文小說；2006年，莫言獲得日本福岡亞洲文化獎，成為繼巴金之後，第二個獲得該獎的中國作家；2008年，《生死疲勞》獲得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隨著莫言在英語世界影響的不斷深入，《紐約時報》對莫言及其作品的關注程度超過任何一個中國作家，同時，莫言也因為不斷登上西方主流大眾傳

7 本期的《編輯推薦》介紹多部作品，其中 Michael T. Kaufman 評價了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1995.7.2。

8 Joseph S. M. Lau, Howard Goldblatt.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XXI.

9 劉莉娜，〈當代文學如何讓海外讀者摘下眼鏡〉，《上海采風》2011.7: 27-33.

媒的版面也成為西方學界和讀者最熟悉的中國當代作家之一。《紐約時報》持續的關注，也使莫言作品在傳播中避免了某些作家作品在西方曇花一現式的尷尬，延續了西方讀者對莫言作品的閱讀興趣與慣性。這一時期，《紐約時報》將莫言作品如《酒國》、《鐵孩》、《師傅越來越幽默》等以簡短書評的方式加以介紹，重點推介的莫言作品是《生死疲勞》，延請耶魯大學教授、著名漢學家、中國史研究專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撰寫了書評“Born Again”（〈重生〉，2008年5月4日），史景遷在文中稱這部小說是「powerful new novel」（一部強有力的新小說），對小說的文學價值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認為「《生死疲勞》中有許多生動的片段。這部小說的背景幾乎涵蓋了中國的整個革命歷程」，「是一部幻想大膽、具有創造力的小說。它不斷地自嘲、重編，並通過文中的評論給讀者以震動」。同時，史景遷還對葛浩文的翻譯大加讚賞，「資深翻譯家葛浩文流利而又優雅的譯筆，無數次再現了這些事件令人同情的時刻。」該報還首次採用插畫的方式來配合報導，插畫出自日本插畫家 Yuko Shimizu（清水裕子）之手，基於小說內容的特別設計帶有某種寓言性質。選擇被譽為「美國漢學三傑」之一的史景遷來操刀撰寫書評，並配以名家的插畫，《紐約時報》對莫言作品的側目可見一斑。阿來在談到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時，認為國外中國文學讀者和出版商，有其「獨特」的閱讀趣味和傾向，「一個是有偏見，包括東方想像，西藏想像，那麼他們預先有一個篩選，他們在看的時候也是一個不斷篩選的過程」；其二，「西方的人偶爾在《華盛頓郵報》討論，但大部分時間還不是把它當作文學來討論，不是把它跟辛格放在一起，跟索爾·貝婁放在一起，或者說用討論他們的方式來討論，而是把它看成揣測中國的方法，他們在小說中分析中國當代社會，帶有一些意識形態，而且非常強烈的。」<sup>10</sup> 這一看法或許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當代文學一貫嚴苛的輿論環境使然，但就史景遷這篇書評來看，已將莫言視作中國當代文學最具代表性和最優秀的作

家之一。至少在這篇書評中，《紐約時報》體現出文學批評的專業性和對莫言這部作品的客觀性。在2008年5月11日的書評「編輯推薦」欄目中，排在首位的即為《生死疲勞》，一部新書能夠得到《紐約時報》的評論已屬不易，還能夠在眾多書籍中入選「編輯推薦」，對很多作者來說，簡直就是天降恩寵，因為入選「編輯推薦」欄目意味著書籍的暢銷，《生死疲勞》也是莫言第一部入選該欄目的作品。葛浩文的翻譯、史景遷的評論、《紐約時報》的特別推薦似乎已經預示著莫言及其作品在西方的影響力將達致一個新的高峰。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紐約時報》進行了深度的、連續性的密集報導，分別在10月11日、12日、15日、17日、19日邀請多位評論員同時在英文版與中文網發文。10月11日獲獎當天，《紐約時報》即刊載了 Andrew Jacobs 和 Sarah Lyall 的“After Fury Over 2010 Peace Prize, China Embraces Nobel Selection”（〈中國擁抱諾貝爾獎〉）、理查·伯恩斯坦的“In China, a Writer Finds a Deep Well”（〈莫言，用黑色幽默對抗殘酷現實〉）、Didi Kirsten Tatlow 的“The Writer, the State and the Nobel”（〈中國體制內產生的首個諾貝爾獎〉）三篇評論，<sup>11</sup> 另有莫言五部小說的英譯書摘，分別是《師傅越來越幽默》、《紅高粱》、《酒國》、《豐乳肥臀》和《天堂蒜薹之歌》。其中，〈中國擁抱諾貝爾獎〉一文刊登在《紐約時報》紙質版當天的頭版A1版，〈莫言，用黑色幽默對抗殘酷現實〉和五部小說的書摘刊載於A5版的圖書專欄，Didi Kirsten Tatlow 的評論則發表在《紐約時報》網站上（所有紙質版的報導也都會出現在數位網站上）。一天之內，《紐約時報》從報紙到數位網站同時對莫言進行了全方位報導，這也是當代中國大陸作家首次得到西方媒體如此的高度關注。當然，這並不排除諾貝爾文學獎本身的光環。Kinzer Stephen 在〈美國人厭倦外國小說〉一文中引述《紐約客》小說編輯 Deborah Treisman 的分析：「美國太大了，每年出版書籍量超過世界任何國家。翻譯的作品雖然出版，但在激烈的競爭

10 張莉，〈傳媒意識形態與「世界文學」的想像——以「顧彬現象」為視點〉，《文藝爭鳴》2009.2: 40-47。

11 這三篇評論原為英文，後被《紐約時報》翻譯成中文，刊發在《紐約時報中文網》，本文使用的這三篇中文標題即為時報中文網使用的標題。

中顯得默默無聞。一方面是因為美國文學是為美國人量身定做的，而很少外國作品具有國際化視野；另外一方面原因是出版社對譯著沒有信心，因此很少投注精力宣傳。唯一能讓外國作品獲得關注的途徑就是作品能獲權威大獎。」<sup>12</sup> 在莫言獲獎的第一時間即能推出系列文章，這也得益於《紐約時報》長期以來對莫言創作狀況的關注。

曾擔任《紐約時報》書評人的董鼎山這樣介紹《紐約時報書評》的選書過程：「《時報書評》大小編輯共數十位，他們首先自新書堆中挑出值得介紹的書（每年約六千種），然後再作精選（約一千種），等於是說，每期週刊最多只能刊出二十來篇書評。」新書進來時，先由十餘位編輯流覽，每人挑出十餘種，每人也必須筆記新書遭拒的原因，交給主編過目。被拒作評的原因往往是『缺乏獨創性』；『片斷拼湊成書』；『過份簡單化，過份誇張』等等。任何被選的新書必須經過這種過程，即使『時報』本報人員寫新書者也不免。」<sup>13</sup> 美國每年平均出版 6 萬多部新書，一本新書進入《紐約時報》編輯的視野之難度可想而知。正是選書之際的嚴肅性和客觀性，使《紐約時報》圖書推薦保持了在知識界與普通大眾心目中一貫的權威性。而《紐約時報》在一天之內用如此之多的版面和形式來報導莫言及其作品，無論對莫言本人，還是其他中國作家，乃至整個中國現代文學都是一次在西方樹立正面形象的絕佳機會。

### 三、作為窺察中國窗口的莫言報導

對剛剛走出國門的中國作家而言，海外大眾傳播媒體上的每一次亮相，都彌足珍貴，都是中國現代文學與西方讀者的一次相遇、碰撞，有助於中國現代作家作品在海外的傳播。毋庸置疑，《紐約時報》對莫言的連續報導，無論是報紙主版，還是每週日的書評版，亦或是

網路版（包括中文版和英文版），為莫言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中國作家成為英語世界的熱門小說家推波助瀾。「從美國的銷售資料來看，銷售量最大的作品是《紅高粱》，自 1994 年 4 月出版以來，已銷售 13,407 冊；其次是《生死疲勞》，共計 11,952 冊，占據第三位的是《天堂蒜薹之歌》，共計 6,413 冊。從銷量上來看，《紅高粱》在美國讀者間的影響力最大，而且在過去的 21 年間，僅 1994 年的版本平均每年的銷量是 638 冊，可見這部作品具有穩定持久的影響力。」<sup>14</sup> 可以說，若無《紐約時報》這樣一份在西方世界舉足輕重的大眾媒體的持續關注，莫言作品在美銷量能否達到上述數位是可以存疑的。

葛浩文在回憶「發現」莫言的時候這樣說：「那是 1988 年，一位香港朋友推薦我看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我很喜歡，也很驚訝莫言能有這種熱情來寫小說，書中描繪的愛與恨非常打動人，於是便有了要翻譯的打算。當時莫言遠沒有現在有名，而我也只是個中華文化的愛好者，想做些自己喜歡並擅長的事。現在想起這些往事，我會覺得有點小自豪，並非為我的翻譯而自豪，而是為我在 20 多年前就發現了莫言這樣的作家而自豪。」但葛浩文並未將這部他閱讀的第一篇莫言作品作為莫言作品翻譯的首選，「後來，我又讀到了《紅高粱》，很是激動，沒看幾頁就已經『坐不住』了，感覺這才是我想要翻譯的東西。我馬上跟莫言說，《天堂蒜薹之歌》是很了不起，但是我覺得做為他第一本與英語讀者見面的作品，《紅高粱》會更適合，所以我先翻譯了《紅高粱》。」<sup>15</sup> 固然沒有證據證明，1988 年《紐約時報》對小說《紅高粱》的提及與葛浩文選擇《紅高粱》作為其莫言小說翻譯的起點有直接關聯，但能夠登上《紐約時報》的中國作家的名字無疑更吸引西方漢學家的目光。按德國社會學家伊莉莎白內爾·紐曼教授（Elisabeth Noelle Neumann）「沉默的螺旋」大眾傳播理

12 Kinzer Stephen, "America Yawns at Foreign Fiction," *The New York Times*, 2003.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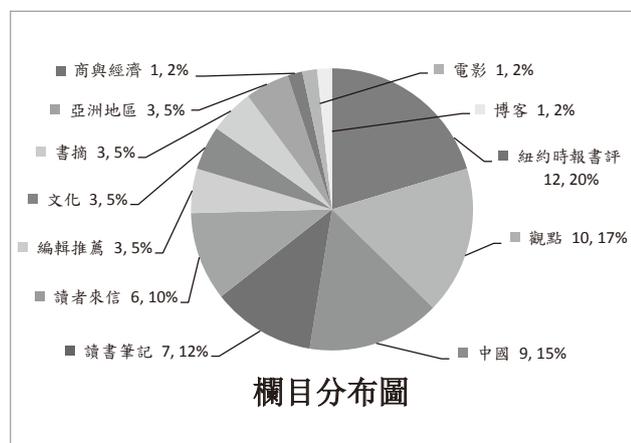
13 董鼎山，〈一本不偏不倚的書評雜誌——《紐約時報書評》〉，挑選新書作評論的過程 <http://magazine.sina.com/gb/coastide/200606/2006-07-11/ba13759.html>.2006.7.11。

14 寧明，〈莫言作品的海外接受——基於作品海外銷量和讀者評論的視野〉，《南方文壇》2016. 3: 70-74。

15 翻譯家葛浩文：為 20 多年前「發現」莫言自豪，<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3/10-20/5400817.shtml>, 2013.10.20。

論，大多數個人會力圖避免由於單獨持有某些態度和信念而產生的孤立；因為害怕孤立，他便不太願意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對葛浩文而言，因為莫言在西方世界的籍籍無名，西方讀者對作品接受的「意見氣候」是不明朗的，作為莫言作品的翻譯者，他多少會擔心作品出版後成為被孤立的少數派，而《紐約時報》的報導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這種擔憂，其報導產生的暖場效應令葛浩文在向西方出版社推薦《紅高粱》譯本時便更加自信，也更具有說服力。

《紐約時報書評》與常被人視為其姐妹刊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TLS*)在編輯方針上截然不同，後者認為「書不是新聞」，而《紐約時報書評》從其第一任主編海塞時代開始，便明確主張「書也是新聞」(Books are news)，與《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更有意識地將自己定位為屬於文化評論的範疇相比，《紐約時報書評》與美國社會政治的互動關係更加密切。<sup>16</sup> 這樣的辦刊方針也使《紐約時報》對莫言的報導不再局限於書評和圖書推薦，莫言的名字出現在「時報看中國」、「觀點」、「讀者來信」、「中參館」、「亞洲」、「博客」等多個欄目(見下圖：欄目分布)，報導人既有供職於《紐約時報》的專業記者，也有海外漢學家和中國文學評論家，如史景遷、林培瑞、藍詩玲(Julia Lovell)、李劫、蔣方舟、陳季冰等。



從上圖可知，《紐約時報》對莫言的報導主要集中在「書評」、「讀書筆記」(含《紐約時報》中文網「讀讀小說」欄目)、「中國」、「觀點」、「讀者來信」等欄目，其中「書評」、「讀書筆記」發表的主要是專業的文學批評；「中國」、「觀點」等欄目則帶有更多的政治意味，報導涉及中國社會政治諸方面，且負面內容居多；「讀者來信」的內容較為複雜，強調不同觀點的論辯。顯然，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莫言已經成為西方世界觀察中國的一個視窗：如〈「莫言熱」難以扭轉中國電子閱讀市場〉(師北辰，2012年10月23日)、〈消費莫言潮中的一場著作權官司〉(葉開，2013年8月26日)等報導將莫言獲獎與中國股市聯繫起來，分析了中國股市中的「莫言板塊」以及電子書銷售和電子版權的保護問題；〈張藝謀的電影和小說不等於中國〉(黎炎，2012年11月12日)是一封讀者來信，作者一方面告誡西方讀者，依據電影和小說認識中國當下社會現實必然是誤讀，另一方面發出了「當電影和文學醉心於描寫黑暗、扭曲和醜陋時」，渴望「陽光、健康和美好」的呼喚，這樣的呼喚在意識形態依然對立的全球化語境中，對當代文學的寫作和傳播無疑是一個警醒；〈長在集中營中的玫瑰也是玫瑰〉(蕭瀚，2012年10月17日)、〈重要的不是莫言保持沉默的權利〉(約翰·拉格奎斯特 2012年12月21日)、〈線民抗議，孔廟將撤下莫言題字〉(Cherie Chan, 2015年5月19日)等報導則是赤裸裸地表現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敵意，將莫言與中國當下的經濟、文化乃至社會發展聯繫起來，這並不是《紐約時報》藉由莫言而生發的報導新思維，而是部分西方大眾媒體長期以來形成的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

無論如何想要保持客觀公正，《紐約時報》畢竟是一份美國社會的主流報紙，承擔著傳播美國國家意識形態與主流價值觀的使命，中美之間長期存在的意識形態、國家利益等分歧，是它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紐約時報》很快就發表了兩

16 田北杭，〈《紐約時報書評》一百年〉，《讀書》1997.5: 116-124。

篇意味深長的評論，分別是〈莫言赴瑞典領獎避談劉曉波〉和〈莫言借演講自我辯解？〉，將莫言獲獎與敏感的政治話題、意識形態分歧聯繫起來，頗有幾分「唯恐天下不亂」的意味。「《紐約時報》在新聞報導中擅長通過事實的精心選擇和排列組合隱秘地表現傾向性和凸顯觀念。」<sup>17</sup> 看似「大義凜然」的報導行為，實有「建構衝突」、吸引眼球之嫌，更是一種政治「抹黑」，上述兩篇評論對中國作家出版自由和寫作自由的相關論述明顯帶有意識形態色彩。此外，《紐約時報》發表了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林培瑞撰寫的兩篇分別題為“Does This Writer Deserve the Prize?”（〈難道這位作家應該獲獎嗎？〉，2012年12月6日）、“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再談莫言：政治以何種方式影響這位元作家〉，2012年12月27日）的評論，林培瑞不出所料地將他對中國政府以及中國政治的狹隘理解與莫言的寫作和獲獎聯繫起來。眾所周知，《紐約時報書評》一般不接受自由投稿，除數量極少的讀者來信外，絕大多數稿件是邀稿，林培瑞的評論當然可視作《紐約時報》的態度。關於莫言是否配得上諾貝爾文學獎，林培瑞明確表示：「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莫言不會在我的名單的頂端。」<sup>18</sup> 他提出王安憶、賈平凹、鄭義、白先勇等中國作家似乎更該獲獎，這種為其他作家打抱不平的方式恰是西方某些學者「迷惑不解地聳聳肩膀」<sup>19</sup> 的常見反應，嘲弄以及意識形態偏見撲面而來。

## 結語

甘陽在比較英美幾家重量級的書評媒體時指出：「1922年喬伊絲的《尤里西斯》在巴黎第一次出版時（當時在英美都遭禁），《增刊》（《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毫無反應，而《時報書評》則在當年5月就有評價很高的介紹。」<sup>20</sup> 在莫言獲獎之後，《紐約時報》或許該慶幸自己又一次及時追蹤了一位諾貝爾獎級別的作家；《紐約時報》因對莫言的持續報導，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其獨到的前瞻性眼光和客觀的評判標準。對莫言而言，從1988年的首次亮相，到2012年獲諾獎之後得到濃墨重彩的渲染，因為《紐約時報》的持續關注在西方世界得到認可，從一位默默無聞的中國鄉土作家成長為世界級的諾獎得主；對中國當代作家而言，應摒除無可避免的意識形態因素，從容看待《紐約時報》等西方大眾媒體在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過程中的助推作用。「借別人的眼光去獲取自知之明，正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的歷史使命，因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過強烈的反差反觀自身，中華文明就找不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sup>21</sup> 從這個意義上看，「以他者作為理解自我的工具，作為建構自身的方式，是任何主體性形成所不可缺少的過程。」<sup>22</sup> 無論西方大眾傳媒的報導是褒是貶，都能為中國當代文學提供反觀自身的自知之明，逐步擺脫在西方譯介傳播的困境，真正達到文化溝通與交流之目的。

17 張小傑，〈《紐約時報》「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觀念建構探析〉，《新聞世界》2013.9: 284-285。

18 林培瑞，〈再談莫言：政治以何種方式影響這位元作家〉，<http://cn.nystyle.com/culture/20121227/c27perrylink/>, 2012.12.27。

19 美國漢學家約翰·伯甯豪森說：「國外對中國革命文學和革命藝術的反應，從充滿敵意到阿諛奉承，形形色色，無所不有，但一個比較典型的反應卻是迷惑不解地聳聳肩膀。」約翰·伯甯豪森、特德·赫特斯，〈《中國革命文學》引言〉，周發祥、陳聖生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國外中國學（文學）研究室編，《國外中國文學研究論叢》（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頁112。

20 同註5。

21 劉東，《海外中國研究系列，總序，孔飛力，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頁1。

22 於治中，〈全球化之下的中國研究〉，《讀書》2007.3: 3-8。